超越“经济主义”:从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再出发

刘超群

[摘　要]　本文以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为起点,首先梳理了内卷化理论的形成背景与核心论述,指出该理论虽然被用以分析印尼殖民地的二元经济结构,但“内卷化”作为特定文化模式,实则构建了一个超越“经济主义”、涵盖社会文化各维度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其次,通过溯源与辨析“内卷化”概念,揭示这一概念是区别于“演化”和“革命”的另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理想类型”,为理解社会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回应了典型“经济主义”视角的批评。再次,文章评述了内卷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创造性使用,包括黄宗智早期在农业经济研究中的狭义运用,以及后来各学者在国家政权、官僚体制和文化实践等领域的拓展使用。最后,文章指出,对“内卷化”概念的“经济主义”式的简化应用或者过度泛化使用可能削弱其潜在的阐释效力。

[关键词]　《农业内卷化》; 内卷化; 格尔茨; 文化生态学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50826.001

一、格尔茨《农业内卷化》的诞生背景

1950 年,格尔茨与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 ①正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读研究生,人类学教授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ln) 将他们推荐给道格拉斯·奥利弗(Douglas Oliver) ,两人由此加入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一个研究项目,计划分别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和亲属制度。研究团队先期进行了一年的集体印尼语训练,之后三年(1952—1954 年) 进入化名为莫佐库托(Modjokuto) ②的爪哇内陆城镇开展调研,该项目也因此命名为“莫佐库托计划”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协同演化视野下山地乡村人居环境的人类学研究”(20CSH031) 。

[作者简介]　刘超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① 希尔德雷德·格尔茨,美国人类学家,也是格尔茨的第一任妻子,其著作有《爪哇的家庭》(1961 年) 、《印尼的文化与社区》(1963 年) 、《巴厘的亲属制度》(1975 年) 、《权力的图像》(1994 年) 、《巴厘寺庙生活》(2004 年) 等。

② Modjokuto 意即“中镇”,该项目出版物中多使用这一化名。但格尔茨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在其著作中也会称之为帕里(Pare) (Handler,1991) 。

(Modjokuto Project)(格尔茨,2017:13;宋红娟,2023)。

这是一个跨学校跨学科的研究项目。项目的哈佛一方是社会关系系的五位人类学博士生、一位社会学博士生、一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和一位临床心理学博士生。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由社会学家帕森斯于 1946 年主持建立,他实验性地将人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组织在一起。20 世纪 50 年代是哈佛社会关系系的黄金时代,也是美国人类学开始扩张、各种思想方法层出不穷的时期(这一活跃扩张期持续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Geertz, 2002;巴特等,2008:340 – 341;格尔茨,2017:6)。格尔茨的第一次田野成果便是在各式学术思潮活跃交织的氛围中诞生的。经由帕森斯的指引,格尔茨沿袭了韦伯的理论传统,这既体现在他对宗教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上——这在他早期的印度尼西亚研究,如《爪哇的宗教》《农业内卷化》《商贩与贵族》中有鲜明印记(Geertz,1960; Geertz,1963a; Geertz,1963b),也体现在贯穿他一生并在后期愈发强调的对文化和意义的阐释上。从后者发展而来的象征主义人类学、阐释人类学,既成为格尔茨最重要的思想标识,也成为美国文化人类学的一面旗帜。但在《农业内卷化》时期,格尔茨的立场与方法显然更加折中(巴特等,2008:344 – 345)。他在书中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的青睐(Geertz,1963a: 6 – 11),而这正是与心智主义人类学对垒的美国新唯物主义人类学的代表。如此偏重从生态与农业模式出发阐述社会变迁,也再未出现于格尔茨的其他作品之中。

莫佐库托计划的另一合作方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于 1952 年建立,致力于对美国援外计划拓展中涉及的亚洲、非洲、东欧、拉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并提供政治和经济建议。莫佐库托计划开始时,国际研究中心尚在组建之中,因此项目由哈佛方主导。待哈佛田野小组归来时,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农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济济一堂,项目管理也转移至此(Geertz, 2002; Price, 2016: 94)。1957 年,该研究中心为格尔茨提供了一个研究员职位,让他能够与前往印尼的经济学家合作,继续整理印尼材料与写作。正是与麻省理工经济学家的讨论,帮助格尔茨完善了《农业内卷化》中对印尼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Handler, 1991)。

冷战时期,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大力鼓励对新兴国家进行调查研究,人类学者的海外田野机会大大拓展,许多大学也建立跨学科区域研究中心,人类学家得以与其他学科学者展开更多合作(巴特等,2008:338 – 339)。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和莫佐库托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些项目及其成果,也标志着人类学从一个调查“原始”部落与岛屿的有限小社群社会的学科(对美国而言主要是印第安人研究),转向对有着自己历史、政治传统和复合文化的大规模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的研究(Geertz, 2002;格尔茨,2017:13;马丹丹,2022)。

作为上述背景下特定项目的产物,《农业内卷化》具有某种特殊的混合性。一方

面，它体现了彼时人类学以及更广泛的不同社会科学思潮与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具备明确的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判断。事实上，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呈现的。格尔茨十分精巧地将韦伯式的问题意识、现代化理论、经济起飞理论、文化生态学方法统合起来，阐述分析印尼作为一个后殖民国家的困境与命运，并塑造了这个兼具理论洞见和经验穿透力的术语——内卷化。

参与莫佐库托计划或者说“印尼调研之行”也正式拉开了格尔茨作为人类学家思考与著述的序幕，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田野选择、思考方式和理论指向。格尔茨的爪哇调研产生了几本不同主题的著作。除了《农业内卷化》专注于相对宏观的农业问题，格尔茨还对莫佐库托的城乡社会及其新兴商业阶层进行了调研，这些材料构成《一个印度尼西亚城镇的社会史》一书(Geertz，1965) 以及《商贩与贵族》①中关于“商贩”巴扎经济转型部分的民族志基础(Geertz，1963b) 。格尔茨在自述中坦诚自己要比哈佛的博士生同事们更感兴趣发展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直接加入更具应用导向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在他 1960 年转去芝加哥大学后的十年又主持了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即另一个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工作小组，继续与同行探讨新兴国家的建设发展问题②。除了围绕经济发展的思考，格尔茨的爪哇调研还有另一个重要部分——宗教研究，这也是莫佐库托项目哈佛大学负责人最初与他商议的主题。基于同一次爪哇调研，格尔茨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爪哇的宗教》(1956 年完成、1960 年出版) ，讨论爪哇宗教的类型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此后，宗教成为贯穿格尔茨学术生涯的核心线索。宗教固然是人类学的经典研究主题之一，但格尔茨还采取了韦伯式的思路，试图分析伊斯兰教在印尼现代化转型中是否可能扮演类似于加尔文新教之于西方的角色(Geertz，1960: 121 – 161) ，因此他的宗教研究与对发展问题的思考是关联起来的。他也采取了韦伯式的比较方法。为了与爪哇混杂性的宗教状况做对比，莫佐库托项目之后，格尔茨又设计了去巴厘岛(印度教) 、西苏门答腊(信奉伊斯兰教的米南加保人故乡) 、北西里伯斯岛(有基督教徒米纳哈萨人) 的调研，但最终只完成了巴厘岛部分(1957—1958 年) (汉德勒，1994)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印尼政治与社会动荡愈发极端，格尔茨被迫中止调研计划，开始寻找印尼以外的田野地，最终他选择了摩洛哥——一个在宗教、规模、复杂性和代表性方面都与莫佐库托相当的城镇继续考察(1964 年、1965—1966 年) (Geertz，2002) 。与印尼从千年印度教王朝转变为伊斯兰社会不同，摩洛哥几乎一开始就信仰伊斯兰教，格尔茨将印尼伊斯兰教称为“多声部的”(mutivoiced) ，认为摩洛哥伊斯兰教更加同质性、标准化，对两者的宗教

① “贵族”的部分来自之后巴厘的调研，但分析框架在这时已经形成。

② 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讨论成果被收录至格尔茨主编的《旧社会与新国家》一书中(Geertz，1963c) 。

比较研究汇集成《伊斯兰观察》一书(Geertz, 1971: 11 – 12)。

因此,莫佐库托计划或者说爪哇调研作为格尔茨的学术起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奠定了他贯穿一生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但是,他在此阶段形成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思考分部——宗教文化与政治经济进程(亦即格尔茨始终秉承的文化与社会之分),在日后并不以同样显要的方式继续发展。格尔茨爪哇阶段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综合性,生态、政治、经济、宗教、伦理之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复合性关联。而从巴厘岛研究开始,尽管仍旧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格尔茨的阐释越来越聚焦文化与象征(马丹丹,2022),例如更强调亲属关系的文化维度(Geertz & Geertz, 1975: 2),提出"宗教是一个象征符号体系"(格尔茨,2014: 111),认为灌溉会社通过仪式来发挥管理作用,并分析仪式庆典如何展演国家(格尔茨,2018: 69,92 – 94)。愈往后期,格尔茨的写作也愈走向更为成熟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从而也最大化了他对"文化的解释"。这些都与《农业内卷化》一书中的文化观形成对照。内卷化被格尔茨视作一种"文化模式",但他此时采取文化生态学的立场,所重视的"文化模式"或者"文化核心",是人与环境之间最互相依赖、互相适应的那部分文化(社会、政治、宗教)特性,亦即与生存活动和经济安排最密切关联的特征集合。由此出发,生态与农业模式才被赋予如此大的权重,成为阐释印尼转型社会之文化模式的关键(Geertz, 1963a: 6 – 7)。这是一种根植于生计生产的文化观,而非具有独立引领力、作为经济生活原因的"经济/文化心态"(Geertz, 1963a: 142),也远未像格尔茨后期所认为的那样,成为更多浓缩至象征表层、符号化的"意义之网"(格尔茨,2014: 5)。

因此,内卷化理论的奠基之作《农业内卷化》,是特定国际政治局势与文化思潮下,美国人类学发展阶段与格尔茨个人学术思想进程交叠的产物。它自始就具有某种复合性,从问题意识到解题思路,都是把经济与生态、文化交织成整体综合论述的。可以说,内卷化理论诞生的视野和方法本就是超越"经济主义"的。

二、格尔茨的论述:印尼殖民地的二元经济与农业内卷化

经济固然是《农业内卷化》一书的重要主题,但其阐释所涉及的维度已经大大超出了经济范畴。格尔茨在书中论述了印尼自身的两种农业生态系统如何与殖民地经济结合,形成二元经济模式,以及此模式如何阻碍印尼本土农业、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由于论述主题之广阔,格尔茨融合了生态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野,且尤其借鉴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视角,同时其方法带有韦伯"理想类型"以及历史—解释学的痕迹。

二元经济是当时多学科学者对印尼经济的共同论断,但格尔茨通过文化生态学的方式给出了机制性解释,并形成"内卷化"这一分析性概念。印尼自身具备两种农业生态系统,内岛/内印尼(主要是爪哇岛)的水稻田和外岛/外印尼(爪哇岛以外)的

烧垦田[①]。水稻田是高度人工化的单一作物系统，十分稳定；烧垦田则依赖多物种间的生物循环，生态脆弱且易退化。于是，粗放的烧垦农业，倾向于以扩散应对人口增长；而精耕细作的水稻田，倾向于在旧地块上投入更密集的劳动来应对人口增长（这构成了之后内卷化的生态基础）。这两种农业生态系统又与一系列殖民地政治经济手段进行了差异化的结合，造成了日益极端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东印度公司主导的殖民初期，荷兰人就试图在爪哇的维生经济（粮食作物）上面叠加出口经济（经济作物）。由此，荷兰人管控的出口部门和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的国内部门的二元经济体系初步形成。

种植制度（Cultuurstelsel）时期（约 1850—1915 年），内印尼与外印尼、劳动密集型的印尼部门与资本密集型的西方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模式进一步稳定与强化。这一效果是借由强制种植作物与印尼农业生态系统的特定互动模式而达成的。荷兰强制印尼种植的大量出口作物中，一年生植物（如甘蔗）可与当地作物形成共生关系，多年生植物（如咖啡）则与当地作物形成孤立关系，成为独立飞地。但恰是共生关系在更大程度上伤害了印尼经济，使得印尼农业内卷化。由于无法同水稻共生，咖啡先是在爪哇未开垦的荒地扩散，形成众多飞地种植园，支撑起 19 世纪中叶的种植园经济；后来扩散至外岛，与当地烧垦农业适应，从而小农也能参与咖啡出口经济。而甘蔗所需生长环境与水稻一致，甘蔗种植的扩张带来水稻种植的扩张。格尔茨通过数据分析表明，在蔗糖产区中，有着更高比例的水稻田、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高的每公顷稻米产量。之所以产量更高，除了灌溉设施改善外，主要来自更密集的劳动投入。随着制糖业发展和人口膨胀，爪哇不断在狭小稻田上愈加精耕细作以容纳更多劳动力，从而吸纳了西方入侵以来几乎所有的新增人口[②]，但人均稻米产量却并未增加，人们生活水平亦无明显提高。格尔茨将此“静态扩张”的过程称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Geertz，1963a：79－80）。内卷化模式以爪哇的劳动力替代了荷兰缺乏的资本发展了蔗糖业。其结果是，尽管爪哇蔗糖出口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它却是荷兰经济而非印尼经济的一部分，印尼人均消费仍处在维生水平。尽管甘蔗与水稻共生，但它们所代表的荷兰经济分支与印尼本土经济却分道扬镳。

荷兰于 1870 年颁布的《土地法》结束了种植制度，开启了印尼的企业种植园时期。该法令及相关措施使得私营企业能够长期租赁土地开办工厂，又避免了企业破坏盈利所依赖的村庄经济。如此一来，荷兰再一次将商业经济叠加于印尼自给经济之上，激发前者又安定后者，深化了二元经济体系。企业种植园蓬勃发展，创造出规模巨大、功能复杂的农业—工业结构，但并没有将印尼乡村带入现代化，而是更全面

① 内岛与内印尼、外岛与外印尼大致对应，但并不完全重叠。

② 最终，仅占国土面积 9% 的爪哇养活了印尼近 2/3 的人口（1961 年数据）（Geertz，1963a：12）。

深入的内卷化。在爪哇,甘蔗与水稻仍在共生,但蔗糖企业种植园与稻作村庄社区以新的方式紧密结合。在土地使用上,种植园与村庄签订租约,利用传统的社区共有权的集体分配程序,循环在村庄 1/3 的土地上种植甘蔗,家户间则以精密复杂的方式定期轮换调配,从而将大型企业农业严格的耕作节奏与传统家庭农业灵活的耕作节奏结合起来,也将适宜甘蔗种植园的大田制运作与适合村庄梯田稻作的小田制结合起来。在作物制度上,旱地作物也加入水稻田的双季轮作,后来又大量开垦旱田,但无论是作物多样化的水稻田还是旱田,都采取了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即以最密集的劳动投入精耕细作以维持基本生计。在分配模式上,除了减少个人土地份额,还通过细化和拓展传统的租赁分成制,使得投入和产出几乎可无限分割,以在有限资源内容纳更多人,如此等等。总之,爪哇不仅在农业生态上,而且在社会文化各方面,都以进一步“内卷化”的方式运作,即在固定却弹性的模式中不断细化,但并未在传统之外创造出新的模式。爪哇农民在成为甘蔗工人的同时,仍旧是以社区为导向的小农,他们没有升级也没有降级,只是能够继续维生。共生的二元经济鸿沟也再次拉大,荷兰企业种植园越来越资本密集,爪哇农民经济越来越劳动密集。

外岛的飞地模式与爪哇大相径庭,不同作物与当地生态和社会以不同方式结合。德利的烟草种植园与当地农民平行运转,是两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并非像爪哇的甘蔗种植园和稻作村庄那样紧密共生。烟草种植园不断扩张挤压烧垦农民活动范围; 烟草种植园也并不雇佣当地农民,而是雇佣外地契约劳工; 种植园作物愈发多样化,但农民和种植园的生态隔离却愈发彻底。20 世纪初,橡胶被引进苏门答腊,又带来了新的改变,以致外岛小农经济实现“起飞”。橡胶树很容易适应热带森林烧垦复合系统,被大量小农户种植并出口。橡胶的成功也带来小农种植其他多年生出口作物(例如椰干、咖啡、胡椒、茶树等) 的激增。到 1937 年,小农出口占荷兰东印度群岛总出口价值份额的近 50%。尽管商业化种植的小农高度集中于广袤外印尼中的某些区域,却已经出现了某种“经济心态”和其他伴生的社会文化现象——更灵活的土地所有权、个人主义、阶级分化、文化理性化等,外岛轮垦农业向园艺模式转变。格尔茨认为,这已然出现了与爪哇内卷化模式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核心”(Geertz,1963a: 120) 。

然而,无论是外岛“农业革命”暂时的乐观形势,还是 1930 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剧变——经济大萧条、战争、革命等,都未改变印尼经济的基本模式: 技术二元性、区域不平衡、生态内卷化。格尔茨在印尼与日本的对比中,对印尼模式的原因给出两个诊断: 一是殖民政府的存在,导致爪哇传统经济中土地与劳动力所蕴含的生产力被用于荷兰而非印尼发展,致使印尼失去了从农业剩余中资助本土现代工业的机会; 二是资本密集型工业以农业(而非制造业) 的形式进入爪哇,工业化农业更易在现代化管理精英和传统劳动力之间形成分工隔离,导致爪哇农民仍然被捆绑在水稻田上,只承担苦力劳动却无法享受工业化成果。印尼模式如此顽固,以至于所有可

能的转变机会一一丧失。化肥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没有工业部门吸纳新增人口，因此不过是加速了农业内卷化。橡胶出口收入用以进口消费必需品，而非改善橡胶工业或发展其他生产性企业，从而外岛橡胶经济并未撼动反而被纳入内卷化。1957 年，荷兰种植园被印尼政府征收，资本密集型产业终于并入印尼经济，看似打破二元经济，但政治社会混乱下的印尼种植园作物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种植园复兴希望渺茫，突破内卷化的新模式犹不可期。于是，在格尔茨所考察的时间范围内，印尼深陷于特定历史塑造的某种模式之中，始终未能实现经济起飞与现代化转型。

从格尔茨的整体阐释可以看出，《农业内卷化》的着眼点的确是印尼经济，基本判断是殖民地背景下印尼的二元经济体系（荷兰 vs 印尼，外印尼 vs 内印尼，资本密集农业 vs 劳动密集农业）阻碍了印尼的经济起飞。但是，解释经济问题必须将其置于更完整的历史情境中，即将其放置在殖民地政治、农业生态系统、当地社会文化组织特点中理解。而最终，经济起飞的失败也表征了整体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失败。于是，用以阐释二元经济具体运行机制的“内卷化”理论大大超出了经济语境，而是一种涵盖了社会诸维度的综合模式。

三、内卷、演化与革命：概念溯源与辨析

格尔茨所使用的“内卷化”概念兼顾抽象性与形象性，生动而直观，其影响力迅速超越了单一学科领域。“内卷化”理论也从针对印尼殖民社会经济的特殊性描述，演变为能有效阐释社会文化制度变迁的普遍化概念。

在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内卷化”被视作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当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模式的时候，这种模式必然具备相当的强度与刚性，可将事物发展强有力地约束在其框架之内，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那些与之偏离的可能，都消化和纳入模式自身之中。格尔茨在该书中将模式的形成、稳固与发展称作“模式的结晶化/固化”（crystallization）（Geertz，1963a：38），很形象地表达出在模式化过程中，事物的各个侧面以某种秩序互相支撑，不断凝固成像晶体那样稳固、坚硬的结构，这时整个系统的能量状态也趋于最低，很难转变为另一种模式。内卷化模式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限定形式，它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其内部可以变化，却仅能以不断精细化的方式变化，并最终变得过度精细化，从而使得整个系统近乎完全僵固化。印尼的内卷化先从爪哇的农业内卷化开始，即水稻种植（后来是水稻—甘蔗轮作）中的劳动内卷化，然后是社会制度的内卷化（例如土地租赁系统复杂化）、作物制度的内卷化（例如旱地作物加入）、文化体系的内卷化（阿班甘世界观等），以及将潜在变革性的技术手段纳入内卷化（例如灌溉、施肥）、将外岛出口经济纳入内卷化（例如橡胶经济）等等，最终印尼的生态、农业、经济、社会、文化几乎全部被卷入这个内部不断繁复、难以向外突破的内卷化体制。内卷

化模式的框架如此坚固,内部如此弹性,既留下继续复杂化的空间,又杜绝真正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不过是作茧自缚(self-defeating) (Geertz, 1963a: 80) 。

格尔茨自述是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韦泽那里借鉴了“内卷化”概念(Geertz,1963a: 80 - 81) 。戈登韦泽在他有关原始社会中个体性、模式及内卷化理论的论文中,用“内卷化”一词形容原始文化的特征: 此文化模式在固定的(一个或多个) 单元内部发挥,不断在内部更复杂、多样和精巧,在外部却保持统一、单调和固化。内卷化模式并非原始文化独有,但由于原始社会更加被模式主导与限制,因而尤为突出。戈登韦泽给出的例子包括毛利人的装饰艺术、哥特式建筑艺术、巴赫的赋格曲、原始社会中十分模式化却异常烦琐的仪式行为等。但在戈登韦泽的论述里,内卷化一词并不呈现明显的负面性,戈登韦泽甚至认为在僵固的形式内部继续复杂化,本身是发展也是创造,只不过是在受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种特殊发展模式。在同一篇文章的其他部分,戈登韦泽对模式有更多积极的表述: 在原始社会中,尽管客观层面上,统一、固定的模式是限制和约束,但在心理层面,却又作为模型和范例,指引内部的个体积极投身,在复制模式上,个人的经验、技能等存在差异,但却都追求卓越,这既为原始人的个体性留下空间,也令他们的生活丰富,充满动态与活力(Goldenweiser,1936) 。格尔茨完全舍弃了戈登韦泽原文中所蕴含的那种文化活力论,他认为内卷化使乡村生活在表面上丰富,实质上却单调贫乏; 他仅将“内卷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用以表达过度使用已经建立的形式,因内部过度精细化而变得僵化的状况(Geertz, 1963a: 82,103) 。并且,因为与发展和现代化理论视角结合,大大强化了内卷化概念中停滞、封闭、反发展的消极面向。

韦森将内卷化一词的使用追溯至康德(韦森,2006)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的附录部分(81 小节) ,的确使用了“内卷化”一词,但他探讨的是有机体/人的合目的性,尚在先验哲学的范畴,与经验世界的社会历史演变相去甚远。但我们仍可从康德的使用中窥见“内卷”(英语 involution,德语 Involution) 与“演化/演进”(英语 evolution,德语 Evolution) 的比较性区分。康德讨论了当时流行的两种有机体预定论: 一种是个体预成论,或叫释出论、先成论(Evolutionstheorie) ,即把有机体生殖视作自身分裂的产物,例如卵细胞中已经预先存在整个生物体的所有器官组织,胚胎发育就是从雏形中不断析分; 另一种是种属预成论,或叫新生论、后成论(Epigenesis) ,把生殖出的有机体视作新产生出来的东西,其中蕴含了按照目的概念而发生的知性创造。相较于种属预成论/后成论那种将生殖者的产生能力视作根据其种属所分有的内在合目的性而预先形成的说法,康德认为,相对立的个体预成论/先成论更应称作退行论(Involutionstheorie) 或套入论(die Theorie der Einschachtelung,亦译作“原型先蕴说”) (康德,2017: 212 - 213; 邓晓芒,2018: 343 - 344)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如果生命体发育只是预先存在了

的雏形的机械性增长和扩展,那么这更接近 Involution(退行、内卷) 一词含义,还称不上 Evolution(演进、进化) 。康德的论述显示了当时观念论对生物学理论的借用与探讨,也反映了 Involution 和 Evolution 的基本语义差别: Involution 是更具封闭性的,并未产生新东西。事实上,Involution 的拉丁词根 *involvere* 本意即为向内卷,在演化生物学上指向内分化,例如细胞分化这样单纯的复制,而生物整体上并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有退化(退行性发展) 的意思。Evolution 的拉丁词根 *evolvere* 则指从卷曲展开,在后来的演化生物学上指产生长期、稳定且能够遗传给下一代的新的东西,也引申出更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演进、进化的含义。而常被放置在一起比较的革命(英语 revolution,德语 Revolution) 一词,其拉丁词根 *revolvere* 意为转向或滚回,15 世纪前后衍生周期性重现、循环变化之意,约 1600 年法语中产生“推翻既定的政治或社会体系”的革命含义,1688 年被用于英国“光荣革命”,德语的非拉丁语词根本身亦有颠覆之意①。革命(revolution) 一词并无演化生物学上的使用。但是演化(evolution) 一词,在 19 世纪中期达尔文演化论之后②,被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迅速借鉴到人类社会领域,并在“演化”基础上增加了“进步”的含义,变成“进化”。于是,革命和演化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对对偶概念,前者指社会政治制度上的急剧变化(但未必产生新东西) ,后者则指社会文化渐进和长时段的变化(产生了新东西) 。

于是,尽管来源于不同线索,但如果将内卷/内卷化(involution) 放置于同革命(revolution) 、演化(evolution) 的比较中,似乎更易于把握其所表达的社会变迁模式的特点: 它不是断裂性的革命剧变,也不是循序渐进的演化之变,而是外部形式不变、内部不断复杂的原地踏步——正如格尔茨所采用的“踩水”比喻——没有(真正的) 变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套说法(包括格尔茨的使用) 已经纳入了明显的社会进化论倾向,这也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盛行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隐含逻辑。格尔茨接受了韦伯—帕森斯的观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一整套结构功能性的变化,也基本接受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模型。正是这样的视角下,他才会对印尼“失败的现代化”发问。他的论述中不乏从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凝视,充满对发展的肯定和对停滞的忧虑: 印尼经济终究没有“起飞”—— “起飞”代表的恰是陡峭转折且能持续的经济增长; 战前,外印尼的“农业革命”只是一场“半革命”——这意味

① 词源部分参考网易有道词典新牛津词典和词源网站(https: //www. etymonline. com/search? q = revolution) 。

② 达尔文只在《物种起源》(1859 年) 的结束段落中使用了一次 evolved,并更喜欢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部分原因是 evolution 已经在被废弃的 18 世纪胚胎发育理论中使用过(也正是康德所对话的“先成论”) ,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带有“进步”的意义,而达尔文的思想中并没有这种意义。但至第六版中,达尔文则多次使用了 evolution,并且将他的理论称为“Theory of Evolution”。

着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为印尼带来真正的变化。而这一切,皆可通过印尼农业生态与殖民地经济叠加产生的“内卷化”机制得到解释: 它几乎卷入了一切,也几乎封闭了一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内卷化”及另外两个词应当被视作某种“理想类型”,是被构建出来用以理解社会现象的一种启发性工具,既非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亦非完整的因果性呈现。格尔茨固然试图系统化地确定变量、评估权重、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尽可能谨慎地给出结论,但他自己也说,“科学”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就是“简化”(Geertz,1963a: 141) 。“内卷化”这一概念的有效性更应在于,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尼的历史与现实,并能启发我们解释更多社会现象。对于前一点,《农业内卷化》一书可谓影响深远,尽管也有人批评其中的误导性; 而对后一点而言,“内卷化”所做到的可能比格尔茨预期的要多很多。它充分证明了学术概念的想象力与影响力,它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看待世界与历史的眼光。“内卷”揭示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变化发展模式,它使得我们在中断性的“革命”和连续性的“演化”之外,还能使用“内卷”这一思想工具,去形容和把握那些“变化却未发展”“有增长无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现象。并且,我们可能会惊异地发现,它所指示的那种图景,在很多情况下更加贴合现实中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

四、超越“经济主义”: 对《农业内卷化》的批评与回应

《农业内卷化》出版之后,最初在西方收获了来自不同学科几乎一致的赞扬,但继而又在其论证的各个细节部分遭受了大量的批评与质疑(Benda,1966; Johns,1966; Conklin,1968; Alexander & Alexander,1978; 1979; 1982) 。该书 1976 被翻译成印尼语,大部分印尼学者的反应从开始就很谨慎。但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在格尔茨之后,所有印尼研究作品都不得不对“内卷化”及其相关论述做出回应。可以说,《农业内卷化》十分积极地影响了学术讨论,它激发了大量后续研究,并为实证修正提供了依据(White,1983) 。

我们在此可以简述一下格尔茨遭受的主要质疑。在内卷化的生态基础部分,不少人挑战了格尔茨关于甘蔗和水稻共生的观点。一些证据表明,甘蔗最初并非在水稻田中种植,而是在雨养土地上,最终是可用劳动力而非生态必要性导致甘蔗集中在灌溉区(Knight,1980) 。并且,将 18 个月的甘蔗和 4 个月的水稻整合轮作种植也是困难的,会相互影响而非支持,许多地区强制种植甘蔗阻碍了水稻高产,破坏了乡村农业(Alexander & Alexander,1978; Knight,1982) 。有学者给出另一个格尔茨忽略的变量——家畜,他们通过数据论证,在高地地区,通过生产玉米和木薯,甘蔗和家畜之间互相吸引(而非甘蔗和水稻) (布姆加尔德,克罗宁伯格,2023) 。在有关爪哇的人口增长上,尽管此事实成为共识,但人们对其原因与作用却有不同推断。一些学者认为,人口增长是农民应对殖民压力的积极反应,而非农业停滞的外部原因(Alexander

& Alexander，1979; Boomgaard，1981; White，1983) ；农业停滞更多是政治经济因素的结果，而非生态和人口因素的产物(Alexander & Alexander，1978) ①。针对内卷化的具体内容，人们对于殖民时期水稻种植是否存在劳动力投入持续加强存在不同看法(Collier，1981a) ，对于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已经十分复杂的土地保有权和劳动力安排更复杂化也存在疑问。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内卷化”趋势并非体现在格尔茨所强调的“文化核心”农业领域，而更多是在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在语言、礼仪、舞蹈、宗教和仪式等日益精细化，但并非源自农民阶层，亦非源自耕种制度时期(White，1983) 。还有许多学者指出格尔茨忽视了爪哇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这削弱了他关于“共享的贫困”之论述的有效性(Koentjaraningrat，1967: 244 － 280; Kartodirdjo，1972; Collier，1981b; Alexander & Alexander，1982) 。在印尼发展趋势上，有学者认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于绿色革命、高产品种、人工化肥、农村信贷、灌溉改善等农业投资的扩大，印尼农业经济出现了爆发性增长，似乎已经“去内卷化”，从而驳斥格尔茨所说的内卷化之顽固性的论调(布姆加尔德，克罗宁伯格，2023) 。此外，还有学者对该书中的日本对照部分提出异议，例如强调日本工业现代化恰是在水稻经济中进行高劳动投入的“勤勉革命”的结果，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模式是与西方资本密集型工业化不同的另一条路径(白馥兰等，2024: 63 － 67) 。

格尔茨在 2005 年《再论农业内卷化》一文中回应了以上大部分批评(Geertz，2005) 。他驳斥说，绝大多数对他的争议(无论褒贬) 都过于“经济主义”(economism) 。这些讨论都很聚焦爪哇，并注重数据分析，书中有关两种生态系统的分析、“外岛”小农出口发展的论述、对不同殖民剥削策略变化的讨论被忽略了，他文末有关超越生态和经济过程的分析，深入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进程中的呼吁，也并未得到重视。在他看来，争议围绕的具体问题，例如内卷化始于何时、19 世纪“人口爆炸”成因、荷兰与爪哇农业技术互动的性质等，尽管在某些时候是值得关注的经验性问题，但它们对削弱或强化《农业内卷化》一书的核心论点贡献不大。“经济主义”的方式认为，社会被经济需求所驱动，却将(社会) 文化外部化，例如把文化视作经济发展的障碍(或者激励) ，再如把文化视作神秘化的意识形态，这种狭隘的研究方法难以揭示印尼社会的复杂变化(Geertz，2005) 。

在他看来，经济主义的批评中，一部分可称为生产方式的视角(经结构主义改造的马克思主义) 。在此视角下，问题变成印尼(尤其是爪哇) 是否经历了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逻辑的侵蚀，是否本土社会已转变为一个商品化的、阶级分化的依附性系统？ 根据这种思路，该视角着意寻找爪哇乡村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分化的典型资本主义迹象，强调地主、富农、无产阶级的产生。格尔茨说，这些元素或许存

① 当然，这些评判并非总是公允，在格尔茨那里，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因素，他们是和生态与人口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

在,但它们更像是一系列微弱的、初期的、局部的波动,很快就被爪哇村庄社会普遍的、渐进的、弥漫的、无情的贫困化所吞噬。对于批评者所指出的某些情况下出现的超越维生水平的富人(Knight,1980; Alexander & Alexander,1982) ,格尔茨反驳说,当繁荣消退,作物模式恢复时,这些富人又消失了(Geertz,1965: 40 – 43; Geertz,2005) 。他们的确出现过,但其影响并未强大到重构爪哇农村社会,并不构成印尼社会的本质特征。格尔茨进一步指出,因为将文化(道德、政治、实践、宗教和美学观念) 视作外化的,才难以摆脱经济对社会的“霸权”且难以揭示物质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无论爪哇发生了什么——无论是普遍内卷化还是阶级分化——都发生在具体社会文化而非抽象“资本主义逻辑”之中(Geertz,2005) 。

在此后对印尼的局势评估中,能看到另一种经济主义思路,即理性行动模式视角(新古典主义加民粹主义情感) 。诸多农业经济学家(及其人类学随行者) 认为,在技术创新(例如引进稻米脱粒机、化肥、农药、杂交水稻) 和新型雇佣实践(例如商业化租赁收割) 过程中,强化了强者地位(例如地主) ,同时削弱弱者,于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不再是“共享的贫困”(Hüsken,1979; Booth & McCawley,1982) 。格尔茨反驳说,这些批评者将一系列边际调整误解为一次全局性的转变,他并不认为新的实践意味着印尼已经确定地摆脱内卷化(Geertz,2005) 。并且,几乎所有格尔茨的反对者,都依赖定量的、广泛的点式调查与公式化分析,而非长期、深入和系统的社区研究,这导致他们无力揭示村庄生活的整体构成方式及其变化。这种经济主义的方式,会看到各种矛盾的数据与结论,例如有些看到收入增长,有些看到不平等增加,有些看到不平等减少。将村庄社会结构粉碎成数字,将文化因素交由其他学科处理,并未导致更高的精确性,而是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格尔茨认为,只有将印尼经济过程重新置于印尼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去除文化外化,才能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从而获得更清晰的答案。而“内卷化”这一印尼发展理论化的初期成果,或许缺乏足够的严谨性与精确性,但却是一种更综合更深刻的一般性追问。另外,格尔茨呼吁,应将此书与其其他关于印尼宗教、分层、政治、集市贸易、村庄组织、家庭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联系起来解读(Geertz,2005) 。

总体而言,格尔茨的反驳是有力的。几乎所有我们列举的批评都是以某种数据分析指出格尔茨观点中的错误,但都未给出关于爪哇或印尼农业转型的替代性观点。而某些肯定格尔茨有关爪哇人口高速增长、劳动集约化、资本投入几近无效等具体论断的学者,也会认为一般常用经济术语足以解释所发生之事,从而贬低格尔茨“内卷化”这一概念的理论化价值(布姆加尔德,克罗宁伯格,2023) 。如前所述,“内卷化”具有某种理想类型的属性,它并不是现实的如实映射(因而驳斥其具体论述的不够准确是容易的) ,而是依据一定的经验规则建构起来,能有效探索社会现象、把握社会现实的概括性命题。事实上,在印尼和西方,阅读《农业内卷化》并接受其观点的人,远比阅读后续研究人员细致的修正性著作的人要多得多。“内卷化”

问世不久便成为社会科学教科书中的标准概念，用以表示一种特定的非进化的、非革命性的变化，在其他国家的乡村和城市研究中被广泛使用(Evers，1981；White，1983) 。甚至，它的意象性而非精确性反而赋予它某种强大的隐喻性力量，容易唤起感知共鸣，从而可以形容更多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因而使得自身意涵不断延展。

五、“内卷化”理论的中国变奏

在所有对内卷化理论的使用中，针对中国的应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作为人口压力更大、传统稻作技术更早成熟、现代化进程相对晚近的国家，与内卷化主题有许多契合适用之处。我们看到，内卷化概念在历史学、农业经济、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被创造使用，这一用语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语言实践中。

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首先针对中国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指代家庭农场中劳力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状况(黄宗智，2014a: 7) 。在他的论述中，华北农业内卷化与阶级分化密切相关，经营式农场或可按需雇佣劳力，但小农家庭农场尤其贫农农场却迫于人口压力而不得不使用内卷的经营方式(黄宗智，2014a: 251) 。黄宗智完全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的。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进一步发展内卷化理论时，将其改译为“过密化”①，将“内卷化”这一广有形象启发性的概念转变为更精准的经济学表达，强调从劳动密集化进一步到过密化的程度差别，更直接地显示其使用聚焦单一经济维度，尽管他也将内卷化/过密化的描述对象从水稻扩大至经济作物甚至手工业，并提出“过密型增长”概念(黄宗智，2014b: 10 – 11) ②。黄宗智认为，长三角水稻经济的劳动密集度与精细度，宋代便已达到 19、20 世纪爪哇的水平，明清时期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则要远超爪哇(黄宗智，2014b: 10，293 – 294) 。其农业经济因而从异常精细、复杂和劳动密集的水稻种植，转入更高一层次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的生产。后两者新增的劳动投入幅度远高于产值增加幅度，因而是劳均产出严重缩减了的农业内卷化。这一效果之所以达成，是因为小农家庭中市场价值极低的妇女、老人与儿童承担了大量劳动，黄宗智称之为高度“家庭化”的内卷化农业生产。这样高度的内卷化农业，在明清时期的长三角，消灭了依赖雇工、带有原始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因为雇佣男工无法与更廉价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竞争；它还顽强地

① 但后来，黄宗智又重新使用“内卷化”这一汉译表述长三角小农经济，也开始在超越经济主义的范畴上使用这一概念(黄宗智，2020；2021) 。

② 黄宗智对格尔茨的内卷化概念存在一定误解。他认为格尔茨仅把内卷化/过密化运用于水稻生产(黄宗智，2014b: 10) ，但实际上格尔茨的内卷化含义远不局限于水稻或者农业。

拒绝了农业的机械化,因为三锭纺车的成本要高于儿童与老人的“机会成本”(黄宗智,2014b: 69) ,内卷化甚至继续加剧。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引进拖拉机后,从单季稻转为双季稻种植,劳动内卷更进一步,农业变得“超内卷化”。直到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从事非农就业,加之长期计划生育降低了新增劳动力,21 世纪后,农业劳动力总数逐年递减,人均土地增加,因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农业“去内卷化”,也出现越来越多“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新农业”,伴随更多的资本投入,其亩均和劳均收益都有所增加,“去内卷化”趋势加强(黄宗智,2016; 2021) 。

黄宗智对中国的研究拓展了农业内卷化的应用场景,也呈现出中国内卷化的特点: 土地资源极端稀缺下的高度内卷化,甚至无法像格尔茨在爪哇看到的那样维持人均劳动边际效益; 从传统农业拓展到手工业及新兴商业化农业,但并未太涉及其他社会文化范畴; 对小农户家庭经济单位的廉价高效持相对正面的评价态度,他们曾经支撑了极度内卷化的农业,也在新境遇下能兼具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去内卷化”,由此走出与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黄宗智有关华北和长三角的两部著作,影响和争议同样广泛,包括史料运用、农业相关的数字计算,对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工业的阐释,对“内卷化”概念使用恰当与否,等等(刘世定,邱泽奇,2004) 。事实上,格尔茨回应质疑的方式同样适用于反驳这些批评,甚至可以用来评价黄宗智自己的研究——它们都多少过于“经济主义”。黄宗智对内卷化的使用更强调劳动边际效益递减,已经是在相对窄化的含义上使用内卷化理论,而对他的批评也陷入更狭窄的数字演算上的证明。

格尔茨的内卷化从农业劳动内卷化出发,最终近乎纳入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由于某些限制性因素,仅能在模式内部变化,导致过度复杂化和精细化,从而使得整个系统几乎完全僵固化,无力转变成其他新的模式。黄宗智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中劳动高度内卷化、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情况,虽符合内卷化模式意涵,但也不成比例地强化了经济分析维度。然而,后来有更多学者,包括黄宗智本人,在农业与经济领域之外,例如国家政权、社会结构和文化领域,同样使用并发展了内卷化理论。

杜赞奇使用“国家政权内卷化”(或译“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 一词,概括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这一现象: 在国家政权的扩张过程中,虽然国家从乡村提取越来越多的税收,但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的比例并未增加,而是伴随着非正式机构的扩大(即营利型经纪体制深入至乡村) 及其收入的增加。这种国家政权并非依靠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提高,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的方式,即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杜赞奇,2008: 54 - 55) 。萧凤霞借用“国家内卷化”讨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她发现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地方社会乃至普通百姓的方方面面都在不自觉地复制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权力结构,人们希望通过行政权力攫取利益,从而强化了行

政结构的重要性，即在社会生活中扩大国家制度的结构化秩序，国家与社会“共卷”(Siu，1989) 。张小军(1998) 也提到，在惯习与场域的共同作用下，行动者以更精致化的文化实践参与社会复制，即所谓“文化内卷化”。黄宗智还进一步指出，2006 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通过“项目制”向农村输入资源，但因过度依赖基层的谋利型势力而导致其效能递减；如今，基层政权正在被大规模地正式官僚化，国家将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和内卷机制强加于村庄，使基层陷入在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上愈加繁复的“官僚主义内卷化”①。

当然，以上各种国家或官僚制的内卷化并非仅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弊病，更是现代科层官僚体制普遍带有的内卷倾向②。黄宗智认为，正是资源贫乏与人口压力导致的类农业内卷化的机制，与官僚主义体系内生逻辑的官僚主义内卷化结合，导致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形形色色的“内卷化”③。项飙补充指出，还同时存在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即便是那些非市场性的领域，例如教育，也在模拟市场竞争让大家参与④。如此一来，应试教育体系、高校学术生产评估、企业管理与职场竞争等，既是过多的人口面对有限的资源，又有官僚主义式管理与日俱增的形式化、标准化与复杂化，还有类市场竞争机制的鞭策，导致人们处于激烈“内卷化”的、非自愿的、效率低下的恶性竞争中，不断自我动员，用极大付出换取极少回报。像“内卷化”文化模式所意味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一样，人们感受到的“内卷”也是“无法退出的机制”⑤，个人生活水平的维系与社会整体的运行似乎不得不依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人们只能不停地“抽打”自己，像陀螺一样空转，却不感到有益于实质性的进步，也看不到突破现有模式的可能。正是这种普遍感受到的疲惫、无意义、内耗与无奈感，使得“内卷”一词在 2020 年突破学术界的藩篱，迅速融入日常话语，成为刻画当代社会竞争困境与大众心理的流行词汇(杨

① 黄宗智. 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 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https: //www. lishiyushehui. cn/article/item/1092。

② 例如，韦伯(2020: 40) 就曾指出，“行政的官僚化一向就意味着行政事务之某种程度的扩展，首先是量的扩展”。而官僚制在纯粹技术上的优越性，令其不仅适用于现代国家繁杂的行政事务，亦符合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其他领域日益增长的对精确性、稳定性和敏捷性的需求(韦伯，2020: 46 - 48) 。现代社会官僚制与理性化的内在倾向或许早就预见了它不断在更多方面更加“内卷”的命运。

③ 黄宗智. 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 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https: //www. lishiyushehui. cn/article/item/1092。

④ 项飙. 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 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https: //m.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9648585。

⑤ 项飙. 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 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https: //m.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9648585。

加伟,2022) 。这些对内卷化广泛而弹性地使用,超越了经济主义视角,展现出这一概念的启发性与生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度泛化使用亦可能会模糊内卷化理论的边界,从而削弱它本可更具历史深度与分析厚度的阐释力。

六、结束语

带着“内卷化”的比较性视野,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自身与世界。如果我们向后看,会庆幸中国没有像印尼一样遭遇殖民体系下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独立自主保证了政治与经济精英的互相支持,能给中国经济以“猛推”。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也被用于中国自身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城市最终吸纳并稀释了乡村人口,并通过国家政策逐渐反哺乡村。因此,除了农业领域自身的去内卷化,中国内部的城乡二元也蕴含了一定的突破模式的动力机制。而即便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后,我们发现在政治制度(尤其基层治理) 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亦容易陷入“内卷化”那种内部不断复杂精细、难以向外突围的模式。这种非经济的内卷甚至更顽固,也是全世界都在面临的困境。似乎“内卷”比“革命”“演化”都更贴切地描述了当下的世界: 各国政治体制的自我封闭与自我加强,官僚主义与工具理性加剧,席卷世界的“优绩主义”陷阱,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极化……我们一方面处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中,享受着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却并未清楚看到社会制度上的真正突破,反而目睹了世界的不断向内倾与向后退。在格尔茨曾经忧虑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早已大步迈进,却又不断发现步步深陷现代性的“铁笼”。如何在“内卷化”趋势中创新突围,应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共同课题。

[参考文献]

巴特,金格里希,帕金,等,2008.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 高丙中,欧阳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白馥兰,哈恩,卢杜萨米,等,2024.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 于楠,译.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布姆加尔德,克罗宁伯格,2023. 爪哇的稻米、糖和家畜,1820—1940: 自格尔茨的《农业的内卷化》出版 50 年以来//白馥兰,等编. 稻米: 全球网络与新历史.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邓晓芒,2018. 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 北京: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杜赞奇,2008.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尔茨,2014. 文化的解释.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格尔茨,2017. 烛幽之光: 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 甘会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尔茨,2018. 尼加拉: 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赵丙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汉德勒，1994. 克利福德·格尔茨访谈录. 艾石，译. 民族译丛(5)：18－32，8

黄宗智，2014a.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b.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6.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 开放时代(2)：10－35

黄宗智，2020. 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 开放时代(4)：125－139

黄宗智，2021.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 开放时代(1)：156－168

康德，2017. 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世定，邱泽奇，2004. “内卷化”概念辨析. 社会学研究(5)：96－110

马丹丹，2022. 经济/社会的文类显现与衰退——回顾格尔茨在爪哇、巴厘岛的早期田野调查. 开放时代(2)：195－211

宋红娟，2023. 格尔茨列传：1950—1990.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1)：175－186

韦伯，2020. 支配社会学. 康乐，简惠美，译. 上海三联书店

韦森，2006.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 社会科学战线(1)：72－85

杨加伟，2022. “Involution”与“内卷”概念的翻译对等度考察. 现代语言学(3)：405－412

张小军，1998. 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 二十一世纪(45)：150－159

Alexander，Jennifer，Paul Alexander，1978. Sugar，rice and irrigation in colonial Java. Ethnohistory(3)：207－223

Alexander，Jennifer，Paul Alexander，1979. Labour demands and the ‘involution’ of Javanese agriculture. Social Analysis(3)：22－44

Alexander，Jennifer，Paul Alexander，1982. Shared poverty as ideology：agrarian relationships in colonial Java. Man(4)：597－619

Benda，Harry J.，1966. General and ethnology：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Clifford Geertz. American Anthropologist(6)：1542－1545

Boomgaard，Peter，1981. Female labour and population growth on 19th century Java. Review of Indonesian and Malayan Affairs(2)：1－31

Booth，Anne，Peter McCawley，1982. The Indonesian economy since the mid－sixties//Anne Booth，Peter McCawley. The Indonesian economy during the Suharto era.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William，1981a. Declining labour absorption (1878—1980) in Javanese rice production. Kajian Ekonomi Malaysia，17：102－136

Collier，William，1981b. Agricultural evolution in Java//Gary E. Hansen，e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New York：Routledge

Conklin，Harold C.，1968.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Clifford Geertz. American Anthropologist(3) : 599 – 600

Evers, Hans-Dieter, 1981.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A Colloquium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ectures, Workshops, an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Geertz, Clifford, 1960. The Religion of Java. Glencoe: The Free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63a.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63b.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change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63c.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Geertz, Clifford, 1965.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71.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ertz, Clifford, 2002. An inconstant profession: the anthropological life in interesting tim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 1 – 19

Geertz, Clifford, 2005.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revisited//Marc Edelman, Angelique Haugerud,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ro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o Contemporary Neoliberalism. Malden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Geertz, Hildred, Clifford Geertz, 1975. Kinship in Bal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enweiser, Alexander A. , 1936.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Robert H. Lowie, 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resented to A. L. Kroeber in Celebrat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June 11, 193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ndler, Richard, 1991. An Interview with Clifford Geertz. Current Anthropology(5) : 603 – 613

Hüsken, Frank. 1979. Landlords, sharecroppers and agricultural labourers: changing labour relations in rural Jav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 : 140 – 151

Johns, Anthony, 1966. Reviewed work: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Agricultural History(1) : 59 – 60

Kartodirdjo, Sartono, 1972. Agrarian radicalism in Java: its setting and development//Claire Holt, 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night, Roger, 1980. From plantation to padi-field: the origi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Java's sugar industry. Modern Asian Studies(2) : 177 – 204

Knight, Roger, 1982. Capitalism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Java//Hamza Alavi, Peter Burns, Roger Knight, et al. Capitalism and Coloni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Koentjaraningrat, 1967. Tjelapar, a village in south central Java//Koentjaraningrat, ed. Villages in Indone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rice, David, 2016. Cold War Anthropology: The CIA, the Pentagon, and the Growth of Dual Use Anthrop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iu, Helen, 1989. Socialist peddlers and princes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 American Ethnology(2): 195 – 212

White, Benjamin, 198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nd its critics: twenty years afte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2): 18 – 31

Beyond Economism: Geertz'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Revisited

LIU Chaoqu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Clifford Geertz'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It begins by outlin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main arguments of involution theory, noting that although the theory was originally used to analyze the dualism of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Indonesia, “involution” as a specific cultural pattern actually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transcends “economism” and encompasses various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Secondly, through tracing the origins of “involu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is concept reveals an new “ideal type” of social development distinct from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offering a powerful conceptual tool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phenomena and responding to critiques from a typical “economistic” perspective. Furthermore, the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involution theory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cluding Philip Huang's early, narrower use of the concept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 studies, as well as its later expansion by various scholars to interpret state power, bureaucratic system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 addition, the paper cautions that both a reductive “economistic” application and an overly generalized use of the concept of “involution” risk weakening its explanatory potential.

Keyword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Involution; Geertz; Cultural ecology